

# 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赵冬菊

(湖北宜昌市博物馆 湖北宜昌 443000)

Folk culture and intangible culture relics have always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The folk culture relics contains rich intangible culture relics, and vice versa. They both belong to culture heritag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Folk culture relics' emphasis is on the material side, while intangible relics on spiritual. Under the global economy integration, multiculturalization and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eakens weaker culture, these two culture relics are in urgent need of our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research of which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and significant meaning.

Key Words Folk Culture Relics Intangible Relics Relation

**内容提要** 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它们同属人类文化遗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和强势文化不断削弱弱势文化而急需保存我们文化多样性的形势下,加强二者的保护、传承和研究,特别是二者的结合研究,对保存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将更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民俗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系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些文化,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这两个方面都不仅张显着中国古老文明的历史,而且将 56 个民族凝聚在了一起。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包括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矛盾、斗争,不可避免地将对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对多元文化的共存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构成严峻挑战……使得弱势文化或者说地域文化遭到削弱,甚至陷入灭亡的境地”<sup>[1]</sup>的时候,以及全球文化多元化和保存文化多样性十分紧迫的格局中,重视二者的衔接沟通,对保护我们文化的多样性,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就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作一肤浅探讨。

一 民俗文物含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从表面看来,民俗文物是实物资料,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关系似乎不大。在现实生活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还为数不少。所以,目前属于实物部分的文化或文物工作,就归口到了文物部门,即博物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就归口到了其它部门。笔者在这里提及这一问题,目的并不在于谁管理和如何归口管理的问题,而在于强调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不可分离和相互渗透的问题。

实际上,民俗文物中包含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被称为“无形文化遗产”,后发展为“口传与非物质遗产”,最后才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随着 20 世纪后期勃兴的对文化遗产的高度关注下产生的,其背后所隐藏的是全球性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观念的一场变革运动。

我们现在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是指

“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大会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有的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述内容进一步概括为技艺类和习俗类两个大类。技艺类主要指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习俗类主要指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sup>[2]</sup>。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些特点包括:(1)时空性。因为它是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以及特定的经济基础、习俗风尚、意识形态……之中,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同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活动中所形成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2)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离不开活的人体、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思维模式、或以具体实物等为道具的文化实体等物质文化因素。(3)互动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无论是传说与表述、艺术的表演、礼仪习俗的应用和传承、工艺技能的流程和传播,还是在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都是通过人与文化交流互动的动态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它又具有动态性或互动性的特点。

我们在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特点后,不难发现,民俗文物中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首先,在民俗文物的理论或概念中,包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在民俗文物的概念中,包括有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某一地区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仪礼、信仰、文化、娱乐等民俗事项的文化遗存,它是民俗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反映。民俗文物的形式或外壳是“物”,内容却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生产、生活、岁时节令、民间文艺、宗教信仰、礼仪、

民间组织(如家庭)等”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技能等非物质文化。可见,从民俗文物的本身来说,民俗文物就是“物”。但这些“物”反映的内容、特质或精神是什么,则要通过民俗文物“物”的外壳或种种特征去了解和把握。

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

其次,在具体的民族民俗文物实践中,民俗文物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分十足。

以贵州的民俗文物为例,在贵州征集的刺绣围腰、背扇、袖片、肩片和蜡染床单、被面、挎包、搭帕等民俗文物中,都绘制有“鱼蛙变人”、“牛龙变人”、“神鸟孵人”、“蝴蝶孵人”、“蜘蛛救人”等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纹饰图案<sup>[3]</sup>。这些纹饰图案的背后无不带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在绘有“猫咪叫春”、“两鸟接吻”、“锦鸡交尾”等图案的床单、被面和背扇心等作为新郎、新娘结婚礼物的蜡染制品中,既表达了生殖繁衍的性崇拜、性观念,也是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的最好例证。

再以湖北地区的民俗文物为例。吊脚楼是人们熟知的不可移动的土家族民族民俗文物,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它却包含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

土家人把兴建新屋吊脚楼作为繁衍子孙的根基,因而看得十分神圣。吊脚楼的兴建,首先要选择房屋风水。因此,在选择地基之前,常找来风水先生看地、择地。择地的原则是“左青龙(江、河),右白虎(大道),前朱雀(有池塘等开阔地),后玄武(有带灵气的山)”。即选择依山面水,前低后高和避风向阳的地方作为屋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中,既有环境学、地理学、地质学、建筑学等方面的学问,也有民族心理、民族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当房屋地基选好后,还要对房屋进行规划布局,典型的土家人传统居室吊脚楼布局为木瓦结构,五柱四列,正屋为三大间<sup>[4]</sup>。中间的开间前面三分之二部分是堂屋。堂屋右侧板壁上贴墙悬挂女性生殖崇拜物——簸箕,左侧则悬挂男主人常用的蓑衣、斗笠和农具等。堂屋两边的两厢结构相同,都以中柱为界,用板壁隔成两间,前半部分是火铺,火炕旁设有一个长方形火墙。周围用四块大青石镶砌,火塘中间放一个铁三脚架,架上置放鼎、锅等以烹调食物。火炕的正上方有一根可上可

下的“冲担钩”(类似滑轮,又叫炕钩或梭钩、梭筒),既可挂物又可悬壶烧水(同时这也是土家族男性生殖崇拜物),每家必有,春、秋、冬三季都在火铺上做饭、饮食、取暖。火铺上面的天楼板是用杂木条子按一定间隔铺砌而成的,叫“楼巴册”或“荆条子”<sup>[5]</sup>。这些内容,都得事先规划布局和设计好。

土家族修建房屋时,堂屋正中顶上都要横搁一根大梁。梁的中央绘着太极图。两头分别写着“荣华富贵、金玉满堂”或“美仑美奂,金玉满堂”,或“帝道遐昌,五谷丰登”之类的对联。同时画着“日月、乾坤”等字样或图案。土家族十分重视这根大梁,且要以偷来的为最好。

建房前,屋主不仅偷偷在大山中寻找分岔成两根的大杉树,而且必须事先了解被偷树的人家是否会骂人,要以会骂人的为最好。当屋主选择好树(杉树,表示家大业正又永久,枝繁叶茂表示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树主人和良辰吉日后,到上梁的前一天夜里,建房人请来8个后生,来到事先相中的这棵树下,点燃三柱香,烧上一盒纸,拜过山神土地,念上一些吉祥词,就将杉树砍下。树被砍下地时,要在树墩上面搭上红布,同时大声燃放鞭炮。待鞭炮放完,就被砍下的树剔除枝叶末节而成一根直木后锯成符合尺寸的两节(根),将两根直木同时从山上滚下,看哪一根的头在前,尾在后,并无伤痕的,就选哪一根为大梁,然后用红布包着12元钱放在树墩下,把被选中的梁木抬回家。第二天,树主人看到自己的树被人偷去做了梁木,也不追究,拿着红包就回家了<sup>[6]</sup>。但有的人见到自己的树被偷了,则破口大骂,建房人则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树主人骂得越厉害,说明房子修起来越发家、发人、发财。所以,他们希望树主人骂得越厉害越好。

而偷树的主人,这一天就在亲朋好友的祝贺声中举行上梁仪式了。

上梁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掌管上梁的人,叫掌墨师傅或歌师,共两人。这两个人一定要是被当地人公认为德高望重的人,且要儿女双全、不重婚、家庭幸福富裕而没有缺妻少子,他们的任务是赞梁。

赞梁有一定的曲调和表演形式。待梁木在屋顶上架好后,赞梁者爬梯而上,一人提酒壶,一人端茶盘(茶盘内放着筷子、酒杯、腊肉、糯米糍粑)。二人各坐在梁木的一端,一边饮酒,一边互问互答。二人用长篇的赞词,赞扬主家的屋场吉利。如提酒壶者赞道:“手提酒壶闪金光,壶中美酒喷喷

香。欢欢喜喜上屋去,要跟主东赞主梁”。端茶盘的接着赞道:“手端茶盘四四方,张郎造就鲁班装。四角造起龙凤樑,金漆盘子摆中央”。礼赞完毕,二人开始上梯,每上一步就唱五句赞词,赞词的内容都是借颂扬古人恭维屋主的,如:“上三步,中三元,刘备关张访大贤,南阳有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下高岗,上十步,十全十美,张郎鲁班下凡间,修起高楼和大厦,主东富贵万万年……”<sup>[7]</sup>。

赞梁后,向下面抛“梁粑粑”(最早为撒“鬼老壳”粑粑,后来演变为撒糍粑、糖果和核桃、板栗等圆形食物,圆形表示团团圆圆,主家幸福美满),掌墨师傅最先是把两个大圆粑粑拿在手里问下面的主人:“要富还是要贵?”主人回答:“富贵都要!”主人回答完毕,两个粑粑随之抛下,以主人家接在怀里为吉,要是接不住则不吉。然后掌墨师傅将小粑粑抛下,梁下的人纷纷争抢粑粑,抢得越多越好。抛过粑粑后,亲友们将一段段五颜六色的布料搭在大梁上,叫“搭梁”,此时鞭炮齐鸣,赞梁者又一步一赞,下到地面,于是,一栋新屋的上梁仪式(有的地方如利川等地叫“立房子”)就这样在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中结束了<sup>[8]</sup>。这些礼仪、风俗及其工艺、技能、场所(或文化空间)……无一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映。

在土司时期,受土司制度等级思想的影响,土家族房屋建筑还有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当时明确规定:“土司的居室可以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其属下官吏住处虽可竖梁柱,但不准盖瓦,一般土民只能杈木架屋,编竹为墙,用树皮或茅草盖房,相当简陋”<sup>[10]</sup>。顾彩在《容美记游》中也记载了土司的房屋是“南府署极雄敞,倚山面溪,前有石街,民居縞比”。而土民,有的甚至连床都没有。

改土归流后,大量汉人迁入土家族地区,带来了汉族的文化,这在土家族的建筑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从规格上看,建筑屋长、宽、高的尺寸,尾数皆不离“八”,“八”的谐音为发。“八”包含了人发、家发、事业发的三大内涵,这与汉文化十分接近。如《杆梁口福事歌》中的“梁口开起一寸八,儿子子孙都发达;东头开了开西头,一股银水绕屋流;梁子开起一寸九,子子孙孙代代有”<sup>[11]</sup>就具有典型的汉文化色彩,这也是民族建筑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体现。所以,我们认为,民族民俗文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实物,而且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科技水平、工艺技能、审美情趣等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反映。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俗文物为载体

从前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民俗文物有关,都以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或表现形式。亦即民俗文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民俗文物而存在。

###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以民俗文物为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与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有区别<sup>[12]</sup>,但它与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又是紧密相连和相辅相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为载体,才能存在和完整表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

在表演艺术、文学、语言、手工艺、民间口头传说、神话、信仰、道德准则、风俗习惯、民间游艺、音乐舞蹈、戏曲、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有民俗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因此,无论是从其自身的诞生、存在还是流传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始终与民俗文物联系在一起。只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就有民俗文物的存在;反之,只要有民俗文物的存在,也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它们都同属于文化遗产,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再比如,苗族女儿会所表现的其男女青年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土家族哭嫁和骂媒所表达的土家姑娘怀春、出嫁的羞涩与企盼,摆手舞所体现的土家族奔放、执拗的苍劲,咂酒所表达的土家族男女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诙谐、撩拨与幽默,摊舞所表现的土家族人对生命降临的欣喜、惊慌以及虔诚的祈福与期待,莲湘所反映的土家人庆贺丰收的狂喜与庆典气氛,撒尔嗬以独特的动律、洒脱的舞姿、粗犷古朴的动作所展现土家人的桀骜奔放、洒脱自信的民族性格”<sup>[13]</sup>……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都不能离开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附着于一定的道具、场所(如跳摆手舞的地方摆手堂等)、器具等物质文化或实体之上的。离开了其中之一,其文化内涵便无法完整表达或诠释。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含有物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似非物质的,但实际上它包括了非物质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比如,民间传说、传统歌谣、谚语、寓言、民间戏曲、歌舞、各种手工艺技能,民间习俗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非物质的,但在其中却隐含了不少物质的成分。

民间传说、故事中,往往有人物和人物的活动,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人物所在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或物质环境),

也因此离不开实物资料。在土家族地区流传盛广的土家族始祖——“向王天子”的传说中,既有人物“向王天子”和“德济娘娘”、“盐水女神”,又有山(武陵钟离山)、洞(赤穴、黑穴)、水(清江)等自然环境(或条件),还有阴阳石、牛角、剑、船等实物……<sup>[14]</sup>只有当这些所有的物质因素贯穿于这则传说之中时,这个传说才能完整表达出来。

谚语、歌谣、寓言也是这样。如,在湖北恩施流行的“两眼泪汪汪,不如拿起刀和枪”的红军谚语里,隐含了人、刀和枪等物质条件,即包含了物质性。同在这里流行的《薅草锣鼓》(歌谣):“清早起来好唱歌,一人领来众人唱,引得太阳东边起,引得河水流下坡,山歌越唱人越多,火红太阳冒山尖,家家户户冒炊烟,长工上坡好半天,老板起床才洗脸,可怜可怜真可怜,想起情哥当长年,半夜还在把磨推,不等天亮又下田……”<sup>[15]</sup>在这则《薅草锣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谣)中,既隐含有人物的活动,也包括有太阳、河水、山坡等自然现象,也隐含有唱歌人唱歌时的鼓乐器具、服饰,薅草时的场所(景)、场面,炊烟时的设备、器具,洗脸时的用具,半夜推磨时的磨子,装食物的器具以及食物等等物质条件。正是这些物质条件承载了这首歌谣,才使得《薅草锣鼓》有了其形成和创作的源泉,也因此才得以存在。

民间的各种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与物质联系在一起。例如,竹编、藤编、草编等各种编织技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些技术用于哪里,即编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来编织,编织后成品的大小、形状、颜色又是怎样……这就是它的物质性问题了。

还有民间的各种习俗、语言等,虽然也是非物质的,但也隐含有物质的成分。端午习俗是人所共知的纪念屈原的习俗,但这个习俗中包粽子、吃粽子和举行纪念或祭祀仪式的场面,以及粽子本身及其包粽子的一切用具等,就是物质的了。民间语言也是这样,它表达的内容总是离不开人物、事件及其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物质环境或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处处隐含着物质性的。

###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转换,可以物质化,可以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事项

笔者曾在《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一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转换,或通过加工,它可以物质化,可以成

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事项。比如,民间传说、寓言、语言、庆典仪式、手工工艺、节日文化等,把它们记录、整理、印刷出来,或将其讲传说、故事、寓言时的场面拍摄下来,就变成了文字、光盘、影像等物质性的东西了。如把它们编成戏剧、小品等文艺节目,其在舞台上的服饰、道具以及活生生的人的表演等,也成了物质性的内容了。我们通常所指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其自身所包含的物质成分以外,它还可以通过以上途径进行转换而变成物质化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特别是民俗方面的物质载体,即民俗文物。

可见,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民俗文物强调的是物质性的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非物质的一面。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二者的结合研究,对保存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将更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1]唐军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共存》,《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1期。

- [2]汪培梓:《试论无形遗产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效应》,《中国博物馆通讯》2004年第8期。
- [3]吴正光:《贵州民族民俗文物中的“崇拜文化”》,《民俗博物馆学刊》1999年第12期。
- [4]刘孝瑜:《土家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
- [5]许传静:《文化变迁中的武陵土家族村落文化研究》,湖北恩施州巴文化研究会主办《巴文化》2006年第2期。
- [6]李诗素:《土家苗寨“习俗”集锦》,《武陵都市报》2006年6月21日。
- [7]2005年春节时本人采访利川市马前乡继昌村建筑木工张世达的记录整理材料。
- [8]湖北鹤峰县村民周来武提供。
- [9]刘伦文:《现代化背景下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湖北民族学院》2003年第5期。
- [10]鹤峰农业民族网:鹤峰县民宗局局长余克臻制定的《鹤峰县特色民居建设及民居改造方案》。
- [11]田敏:《武陵酉水毕兹卡土家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2]赵冬菊:《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
- [13]记者陈千恩、通讯员陈维明、岳阳:《土家人的心灵歌舞——西兰卡普》,《恩施晚报》2006年1月3日。
- [14]肖国松主编、韩致中审定的《长阳民间故事集》第5页(内部资料)。
- [15]湖北恩施市文化馆、恩施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恩施市歌谣分册》第9~10页(内部资料)。

## 《东南文化》2008 年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年创刊,二十多年来已办200余期,深受海内外文化界、学术界、收藏界的推崇,被录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东南文化》坚持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发表新史料和考古新发现为主体、以物质文化史论为主线,定位独到,特色鲜明。主要栏目有: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史论、艺术史论、中外文化交流、文物研究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本刊为大16开本,96页。全年6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28-236。全年订费

165.00元(含邮资),国外订户每年订费为120美元(单价20美元)。凡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购(包括补订、破期订、零售、配套等),可获书价8折优惠,国内邮费为书价的10%。我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发杂志。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何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E-mail: dnwh@chinajournal.net.cn

《东南文化》编辑部  
2008年5月